

南清代之中俄關係

陳復光著



國立雲南大學
文法學院叢書
乙類第一種

有清一代之中俄關係

陳復光著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出版

國立雲南大學文法學院叢書乙類第一種

有清一代之中俄關係一冊

每冊基本定價壹拾伍元 外埠另加運費

著者 陳復光

發行人 國立雲南大學文法學院叢書總編纂 姜亮夫

印刷所 雲南崇文印書館

經售處 全國各埠各大書局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叢書序

三十四年之冬，余辭雲南大學文法學院院長之願未償，乃有刊行叢書之計。稿則躬自訪之，費用則二三友人爲之奔走。一年餘間，共得四十餘萬，而鄉之先達與友輩樂刊全書者，資亦七十餘萬，余亦歸之，以爲叢書費。而同仁至友之不惜珠玉，樂以偉著贊之者，前後凡得若干種，計友人向君覺明之「蠻書校注」，同門劉君叔雅之「玄奘法師傳校注」，友人方君國瑜之「廣音聲譜」，同門潘君大達之「歐洲政治思想史」，余亦以舊著「屈賦校注」附焉。此五種者，皆以次商由商務印書館印行。最近乃得吾友陳君勛仲「有清一代之中俄關係」，奇書也，余別爲跋以歸之，而請列爲叢書乙類之第一種。勛仲欣然應之，蓋所以充其愛國愛鄉之忱，非以私其友也。余旣感其雅量，而又服其高誼，因書以弁其端云。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十日姜亮夫謹序

有清一代之中俄關係序

勛仲同志積廿餘年研究國際政治之所得，完成「有清一代之中俄關係」一書，問序於余。觀其書，見本書所蒐集的史料，異常豐富，內有關於康雍乾間之中俄邦交，帝俄與黑龍江與烏蘇里江，和日俄數度締結密約之經過等珍貴記載，可說是發前人之所未發，且敘述簡要明暢，在國內出版界中，關於中國與帝俄關係的著作，實屬不易得者。余不文，對勛仲此書，本不能贊一詞，但與勛仲相交逾二十年，常相互切磋政錯，亦長隨大及使蘇時，得其贊助甚多，公誼私情，義不容辭，爰不避淺陋，略寄所感，並就正於讀者。

考本書所述範圍，上自尼布楚條約之締結，下迄帝俄之崩潰，在這兩百餘年之時期，中國的主政者為滿清，俄國的主政者為羅曼諾夫皇朝。中國當康雍乾時代，海內乂安，國勢鼎盛，為有清一代統治史中的黃金時代。後因內政不修，致有道光年間鴉片戰爭之慘敗，啓列強侵略之端，國勢遂日漸沒落。俄國的羅曼諾夫皇朝，自彼得大帝以後，國勢未衰，且直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始終是世界強國之一。在此時期中，中俄兩國雖盛衰各別，但大體都有一貫的外交政策維持着和平的關係。外交上雖有若干度的摩擦，但始終未曾以兵戎相見。如本書著者在其英文論文「一六八九年以來之中俄關係」中所言：「就北京與莫斯科論，中俄兩國的和平關係，自雙方往還以來，從未斷絕，只是兩國間偶然發生一時之阻礙與摩擦，但此只算偶然的事件。」帝俄政治家彼德伯爵亦持相似的見解說：「除了兩次重大的議會以外，中俄兩國間維持着親善睦鄰的關係，長達二世紀半。」「俄國及蘇聯在遠東」一書之作雅洪托夫即引羅氏之論斷，為其所著「中俄關係」一章的結論。（均見 Yakovlev—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Far East）書清廷之對俄政策，以維持現狀，權衡利害，以保東北西北邊疆之安全為主要原則；帝俄的對華政策，則為一貫的「和

平侵略。」本書主要旨趣之一，即將兩國間的對外政策，尤其帝俄對華政策之動機與廟議，予以闡釋，藉以證明國際間的外交關係，實有一貫的政策與路線可尋。

我國近百年來，對外既無一定之方針，更談不上一貫之政策；但對俄又稍有別。自康熙經營外蒙，即以和俄爲主要之方針，後來雍乾兩帝用兵西域，也是得和俄之助；左宗棠用兵回疆時，亦同樣以聯絡俄人而得其糧糈之助。甲午戰後，李鴻章爲報復日本，採「還交近攻」聯俄制日的政策；近如民國四年，袁世凱爲應付日本之逼逼，也計劃聯俄而未果。凡此種種史實，都是證明近百年來中國對俄外交政策的一貫性。民國十三年，國父孫中山先生首倡「聯俄」政策，實爲切合時宜的遠大正確的措施。

說到這點，我們不禁發生深刻的感想。清廷對他國無一定的政策，何以對俄獨異，三百年內大體維持着一貫的方針？我可以簡單答覆，多半由於受自然地理條件支配的原故。

立國於世界之上，要想獲得生存的安全，必須以地理環境爲主要決定因素。舉歷史以爲佐證，如德首相俾斯麥首訂阻英制法聯俄的國策，這是德國地理環境的必然產物。德皇威廉一世本此國策，銳意經營，自普丹，普奧，普法諸役，節節勝利以後，竟使德國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達到歐洲盟主的地位。第一次大戰前的威廉二世，和第二次大戰前的希特勒，因違反了自然地理環境的重要性，得意忘形，放棄傳統的國策，向俄挑釁，結果，不但身敗名裂，抑且陷國家民族於屈辱淪亡的悲境。我們稽考世界歷史，凡明智傑出的政治家，莫不體察本國的地理環境，高瞻遠矚，制定國家民族安全的國策，使後世有所遵循。

中蘇均爲毗隣而居的大國，地理關係至爲密切，邊境接壤漫長，爲並世各國所未有者。由國防觀點論，若兩國互相戒備，互相猜疑，步步爲營，即使集中巨大的人力物力，致力於設防工作，以中蘇邊境之袤長，實難以達到理想的國防

標準。在這種特殊的地理條件下，兩個若龍互信互助，和平相處，互不設防，有若美國之於加拿大，則雖形式上不設防，而國防自固。將這筆鉅額的設防費移來作工業建設，兩國均受其益。美加兩國自訂立洛舒，巴格德協定，互不設防後，維持和平與善關係垂百數十年，而美加兩國均受莫大之利益。想中蘇兩國人士不致以此見解爲苛謾。

要之，中蘇邦交的基礎，唯有這種國父遺教，方爲明智。中蘇兩國同爲世界大國，蘇聯領土面積佔全世界陸地六分之一，人口佔全世界人口十分之一，中國領土面積佔全球陸地十二分之一，人口佔全球人口五分之一。這兩大民族之對外方針均繫主和平，若能親善無間，信守盟約，不但可達到共存共榮之目的，且可進而成爲東亞大局之安定力量，以促進世界之和平。

本書爲今日國內討論中俄關係和國際問題具有重要性之著作，杰瀏覽之後，爰書所感，以就敬於勛仲同志。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五日，楊杰序於昆明。

自序

余素喜研究國際政治，二十餘年前，治學哈佛大學，攻外交史及國際法，受教於當日東歐史及國際政治權威學德（Prof. Loeb）柯烈治（Prof. A. Coledge）兩教授。柯教授時正主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語余曰：「研究國際關係，宜以近隣始。以美國學子之立場，應側重研究美國與加拿大及南美洲之關係；以中國學子之立場，應以蘇聯與日本為研究之對象，尤其中國與蘇聯，接壤達九千餘公里，中俄邦交，建立最早，關係密切，與遠東局勢息息相關。中蘇邦交史的研究，實為必要，然不宜斷代為史，子既有志於寫中蘇外交史，宜以寫中俄二百數十年來之邦交史著手。」余亦以為研究過去，可作為兩國關係之銜鑑。今得兩教授之提示與指導，遂決意研究俄史及俄文；同時，在哈佛魏德勒圖書館（*Widener Library*）蒐採有關中俄之西文資料。幸德教授謂余曰：「十七世紀初迄十八世紀末之中俄關係，及俄人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經營黑龍江與烏蘇里江流域之內幕，均詳載於數俄籍：一即卡明斯基之「中俄外交文獻彙集」（*Bartsh-Kamensky—Diplomatische Skizzen*）Die Mezhdu Rossiiskim Kitaiskim Gosudarstvom S 1616—1792）一即巴爾蘇柯夫之「阿穆爾伯爵木里斐岳幅行傳。」（*Ivan Barsukov—Graf N. N. Mouraviev*）一即布克斯塔登之「俄羅斯，中國」（*Buxlowden—Rossii Kitai*）後者於一九〇二年刊行一二百冊於旅順，恐全美僅魏德勒圖書館存一孤本，原稿藏美國博物院。此數書者，均為寫此時代中俄關係之重要參考。」

在華德柯烈治兩教授指導之下，余以論文形式寫成「一六八九年以來之中俄關係」四章。（一六八九年—一九〇〇年）後漫遊歐陸，於柏林衛書坊，獲得巴著「木里斐岳幅行傳」三巨冊，及甫行刊布之「歐洲政治史料」（*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若干冊。卡著之「中俄外交文獻彙集」，則於歸國後向北平前俄使館借閱，足徵

蒐集史料之難也。

論文寫就，僅具輪廓，返國後仍乘暇甄採有關文獻。民國十五年夏，東南大學之約，赴甯作暑期講學，即以中俄邦交爲題，編成綱要供聽講諸生之參考。過滬，求正於章太炎先生，章先生謂中俄邦交關係我東北西北邊疆者甚大，宜有專冊以紀之。翌年，「中國社會與政治科學雜誌」（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總撰「師敏謙徵稿於余，乃以論文第一、二章應。民國十八年多，在南京與胡展堂先生討論中俄問題，胡先生鼓勵作者先將帝俄經營黑龍江與烏蘇里江一章擇要刊布，並承簽題曰「中俄外交秘史之一幕」，由南京建國書店印行五百冊。久之，雅洪托夫教授著有「俄國與蘇聯在遠東」一書，（Victor A. Yakovlev—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Far East）其第一章中，「一九〇五年前之中俄關係」引有作者之若干論斷，並承其由美來函，鼓勵將全書整理，以英文或中文出版。作者深爲感動，而完成此未竟工作之念益堅。然仍以中俄文參考書缺乏，未敢續寫，蓋撰史首在搜羅廣博，取材精當，而撰外交史，尤須採集有關各國對外國策之資料，庶紀事立論，較近客觀。學術研究，宜力求正確也。

民國二十七年，奉命赴莫斯科，乘機蒐集俄方資料，尤以蘇聯「國家政治經濟出版社」刊布之「帝國主義時代之國際關係檔案」（Mezhunarodnye Otnosheniia V Epoku Imperializma）頗有助於本書撰述之取材。惜旅蘇時，此珍貴之史料尚未刊齊；返國後，以在大戰期中，又莫由得其續布者，對本書之補充，不無影響。

次年歸國，鄉居昆明圓山新村，整理舊作。斯時，中文資料較易獲得，足供重要之參考者，如：北平故宮博物院出版之《籌辦夷務始末》、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黃巖王氏所編之《清季外交史料》、李文忠公全書、左文襄公全書、金縉隨筆、王之相劉澤榮兩先生由古俄文譯刊之《清康熙年間俄國來文原檔等要籍》。承張君鳳岐之協助，將在哈佛時所撰論文譯爲中文，整理補充，寫成四十五章各章。張君十五年前，從余於雲南大學，研究國際政治，關於中法外交史，頗具心得，對本

書供獻良多。

今全書脫稿，因中國與帝俄二百二十餘年之關係，自帝俄崩潰，告一段落，有關民國者僅五年，餘均爲釐清與羅曼諾夫皇朝之接觸，故名書曰「有清一代之中俄關係。」至中蘇關係，正待發展，且涉及方面較廣，而重要資料多未刊布，此時撰述，取材匪易，只有俟諸將來，史料較多，立論較爲客觀。書既成，各知友勸刊行，同時，雲南大學文法叢書總撰姜亮夫教授亟欲以之列爲叢書之一，余亦以中俄關係之深且久，宜有較爲翔實之書以紀之，遂決以付梓。惟尚有若干重要史料，散存國內外圖書館，甚至有迄今未刊布者，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一時蒐羅，本書只能視爲初稿，其中舛誤漏略之處，自所難免，尙祈讀者之指正，以俟他日之改定。

本書第五章若干節之整理及全書之校讎，得昆明李君濟五之協助甚多，地圖由梁君開啓繪製，繕謄由汪友泉彭召恩陳寶琳李君慧吳毓琨諸女士分別担任，承姜亮夫楊靜光兩先生題繪封面，併此致謝。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序於昆明。

弁言

就中俄二百餘年之歷史言，東北之東三省，西北之蒙古新疆爲使兩國接近之橋樑，亦即兩國爭執之焦點。俄人自十五世紀末葉，解脫蒙古之羈縛，不及一世紀，不斷向東發展，開疆拓土，樹立其在東西兩鄰西伯利亞之勢力。一六八九年之尼布楚條約，開始中俄之正式關係。時值兩國國勢蒸蒸日上，清廷爲固其塞外，鞏固邊圉，而與帝俄修好，俄廷爲發展東方商務而遠交隣國。雙方相需爲用，而國勢又相埒，故國交上得保持百數十年平等之友誼。此爲中俄關係較單純之時期，除邊界商務傳教諸問題外，尙無其他外在勢力之動盪。

十九世紀中葉，清廷固步自封，內政不修，外遭鴉片戰爭之慘敗，內有太平天國之興起，國勢岌岌，外患加深，帝俄軍閥伺隙乘虛，蠶食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而其使臣則乘英法聯軍與中國作戰之機，假「和平中立者」之地位，迫清廷簽喪失領土之約。清廷處於內憂外患煎迫之下，只圖隱忍讓步，以免邊疆多事，而帝俄又深恐英法勢力之擴大，在侵略過程中，復謀維持清廷之統治權，期以建瓴之勢掌握我東北。嗣後回疆變亂，又在西北佔據伊犁，幾致戰爭。當時，因各有其內政及國際上之顧慮，均適可而止，共謀妥協，兩國和平關係得以維持者，又數十年。然在此期中，中俄國勢之失其平衡及英法等國勢力之東漸，使中俄關係還不似前此之單純，而清廷之外交，亦日居於被動地位矣。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降，正當帝國主義狂烈時期，帝俄金融及工業資本之發展，使其步資本主義先進國之後塵，以近代帝國主義之形態，單獨的或聯合的，在列強劃分世界過程中，競掠殖民地。前因其屢受挫於西方，乃藉俄法同盟之協作，積極對中國作所謂「銀行及鐵道之征服」。「以帝國主義代替憲法，以亞洲代替歐洲，乃當時沙皇給人民之口號也。」（俄史權威貝爾斯教授 Bernard Pares 語）當斯時也，中國新敗於日，遠東國際局勢日益複雜，列強在遠東之角

逐，日益猛烈。是時主持外交之李鴻章，始終認日本爲「中土之遠患」，足爲國防之重大威脅，較英俄德法爲禍尤烈，乃採「遠交近攻」之策，以聯俄爲抗日之初步；而帝俄爲打擊其傳統之敵人英國及新興之日本，以實行其所謂「和平之侵略」，亦自動的與清廷締結秘密之盟。中國自與各國發生外交關係以來，與他國締結正式密約，僅此一次也。結果，帝俄之地主與軍閥、本其「軍事封建」帝國主義之本質，乘甲午中國戰敗於日，強租旅順大連，又乘義和團事變，進兵東三省，卒與列強，尤其英日之利益發生利害衝突，促成英日同盟，引起日俄戰爭而致潰敗。此沙皇制度下之政府以侵略而與清廷締盟，藉締盟而肆行侵略之後果也。

日俄戰後，歐陸局勢日益緊張，「三協商」與「三同盟」之對立，日益尖銳，爲防德奧之威脅，帝俄移其視線於西方，乃急轉直下，與日本謀攜手，以期鞏固其遠東之地位。此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期間以中國爲對象之數度日俄密約之所由締結也。自一九〇七年以迄羅曼諾夫皇朝之崩潰，帝俄政府在日俄協作下，亦如在法俄協作下，仍不斷侵略中國。若無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俄劃分中國勢力範圍計劃之實施，恐不旋踵而引起遠東猛烈之國際鬥爭也。

就地理環境言，其影響一國之國策者甚大。俄國自開拓東部西伯利亞以達北太平洋，領土橫跨歐亞兩洲，爲一廣袤之整片大陸。地緣政治權威馬特氏（Sir Halford Macintyre）所謂全球之「中心地」，（Heartland）其大部份均屬俄領，既擁有優越國家所具備之大空間，復具有世界各國中最長之海岸線。（約計一萬三千公里）然以其領海洋切斷，且缺乏溫暖之海洋，此彼得大帝「不求土地而求水」之言所由發也。其在西方也，首與瑞典戰，取得沿波羅的海諸省，握通波海之孔道，達到其「向西啓窗」之宏願。俄國自是成爲歐洲之一強。繼之，加他鄰大帝爲控制黑海而屢與土耳其戰，獲得沿黑海之諸重鎮。嗣後之帝俄執政者，因進而期控制達達尼爾海峽，又屢與土戰而屢受挫於英，終未能稱雄地中海。

，此爲帝俄時代最大之遺憾。保羅一世（Paul I）與拿破崙聯合，遠渡重洋進窺印度之計劃，雖未實現，然使英帝國坐臥不安者，又達一世紀之久。帝俄之在遠東也，自經數世紀之開拓經營，於一八六九年建立海參崴要塞，遂成爲太平洋之一壘，進而囊括我東北，卒爲爭霸北太平洋而與日戰。綜計自十七世紀末葉以迄第一次歐洲大戰，二百餘年期間，帝俄外交軍事之目標，大半側重奪取海洋。此研究俄國國策所應認識者一。

俄國領土雖橫跨歐亞，然以其開闢東歐，其國家之活力重心，仍寄於歐俄。歐洲國際政治之動靜，與之息息相關，爲其決定對外國策之主要因素。試以其對外戰爭言，自俄國立國以來，大小十餘戰，均在歐陸，亦爲其全力以赴之生死戰。其在遠東也，僅十七世紀末中俄聯京薩之軍事衝突及後此二百餘年之日俄戰爭而已。日俄戰爭爲兩國在北太平洋之爭霸戰，俄雖戰敗，結果，不過放棄其在南滿與朝鮮之勢力，而其稱強自若也。換言之，亞俄者，俄國之樊衛，歐俄者，俄國國家生命之所寄也。歐陸無驚，始亟謀向遠東發展；歐陸多事，則必先謀亞俄之安全，以避免東西夾攻。此爲研究俄國國策所應認識者二。

綜言之，中國與帝俄之邦交，基於平等親善之關係而建立，而維持者，僅自尼布楚條約迄中英鴉片戰爭之百五十年耳。其後之七十餘年期間，正當帝國主義侵略狂之時代，清廷不確定思痛，力圖自強，形成遠東之安定力量，乃苟且偷安，昏庸腐敗，治國家爲次殖民地，成爲列強鬥爭之對象。結果，無論勝負誰屬，終受其殃。在帝俄方面，則因不斷肆行其「軍事封建」之帝國主義，亦終自食其侵略之果。此爲中國與帝俄邦交史上深堪遺憾之一頁。

自震撼世界之十月革命成功，蘇聯外則維持世界和平，內則墾殖建設，卒能以最大最英勇之犧牲，粉碎納粹之侵略，一躍而爲世界最強大國家之一，更爲歐亞之巨大勢力。各國人士，對於其大勢力，不啻驚愕，懷疑，或畏忌，總須面臨事實，作客觀的檢討，理智的應付。夫蘇聯所懷疑而畏忌者，亦爲他國之侵略，尤其是鄰邦之擴張。倫敦大學教授米

諾斯基，對蘇聯此種疑懼心理，正確言道：「蘇聯歷倒一切之顧望，即在獲得安全，避免其在歷史上所習見之恐懼。湯伊比教授（A.F.Townbee）言：『蘇聯政府仍繼續和帝俄時代遺留下來之一舊問題奮鬥，即應付不容其得到喘息之隣國。』」周此以解釋蘇聯之革命，則不正確，以之解釋歷史部份，余甚同意。」明乎此，則知數十年來蘇聯之所以力謀其國防之鞏固，以備「予打擊者以更大之打擊」。明乎蘇聯自十月革命後未及十年，發揮其地大物豐民強之雄厚潛力，以向單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之途程邁進，則知其所以以保持世界和平，以鞏固與他國之商業聯繫，以與隣國建立互惠平等之善隣關係，爲其外交政策之基本原則。但在保障國土安全得以努力國內建設而謀國家民族之利益爲第一要義之原則下，蘇聯外交是根據於辯證邏輯而作機動的運用，即史達林所謂「事實的邏輯強於任何邏輯。」自蘇聯粉碎十四國之軍事干涉結束內戰二十餘年以來，其外交政策各階段之運用極爲機敏。在和平建設期間，（一九二二年—一九三九年）首則從事於與各國復交之活動，繼則參加軍縮，加入國聯，進而力主集體安全，與各隣邦締結多邊互不侵犯條約。及納粹與法西斯之德黨不斷的肆行侵略，而非法對德意力謀經銷，於慕尼黑會議中摒棄蘇聯，有轉移希特勒目標向蘇發展之勢，蘇聯於英法蘇軍談判失敗後，不得已始以閉關式的外交與德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以期保持德蘇間之和平，而得以繼續加緊國內之建設，爭取國防準備之時間。當德蘇戰爭爆發之前夕，爲防受東西夾攻計，復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在對德抗戰期間轉而與英蘇密切合作以冀得勝利。今後蘇聯之外交，無疑的，亦將針對各國對之之動態而作機敏之運用；其主旨仍不外保障國土安全與民族利益之原則下而倡導世界和平也。

中蘇國境毗連達九千餘公里，爲世界隣邦接壤之最長者。華萊士先生曾言：「中蘇兩國如此漫長相連之國境，非兩國邦交之障礙，乃兩國和平之保護。」即以中國與帝俄二百二十餘年之關係論，大體均能維持和平。嚴格言之，中俄邦交史中，可說無「中俄戰爭」字樣。兩國以往稍具遠見之政治家類能了解此義，知雙方若動以兵戎相見，必致兩敗俱傷

• 尼布楚條約締結未久，康熙帝即首倡中俄和平友好之議，囑俄使臣伊塞瑪依洛夫轉致彼得大帝曰：「……俄國方面雖有二三十人逃來中國，而中國方面亦有人逃往俄國，惟兩國睦誼，絕不能因此輩無賴之徒有所變更，蓋朕始終欲保持與貴國大皇帝陛下鞏固之和平也。且我兩國無必爭之理。俄國爲嚴寒遼遠之國家，朕如欲派兵前往，必致全軍覆沒，且縱有所獲，於朕究有何益？俄國君主亦同。假如爲對抗朕躬亦調兵遣將，於貴國人民所不習慣之炎熱地帶，豈僅使之無端而死耶？戰爭究於兩國有何利益？兩國皆有許多土地以圖自存也。」（見本書頁五〇—五一）康熙帝之嚮愛兩國和平，亦於斯見之矣。

中蘇兩大民主國相繼成立後，兩國之友好邦交，本於兩大民族傑出之偉大領袖——孫中山先生與列寧相互崇拜之懇摯情緒以建立。這在民國元年，中山先生任臨時大總統時，尙在亡命時代之列寧，即表示其崇拜之意曰：「……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乃一革命之民主主義者，高尚而英勇。如無其崇高誠摯之民主信念，使其能進行奇蹟式之事業，如無此種信念以充塞中山主義之每一部份，則使中國人民自中世紀之奴役中解放出來，即不可能。」（Lenin—Selected Works, vol. IV. P. 307）

蘇聯政府成立，本國際道義之精神，首先尊重中國之主權，自動放棄沙皇政府時代侵奪中國之權益。此使中蘇友感自然增進。一九二二年八月，復派其第一流外交家越飛來華，分別與北京政府及中山先生接洽。次年，越飛因病往日本，路過上海，與中山先生會晤，旋即發表聯合宣言，申述中蘇兩國之一般關係，以及蘇聯援助中國革命事業等事。代表全民意志之中山先生，於是訂「聯俄」爲當時對外之基本政策，而於彌留時，復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書曰：「……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爲基礎之國際制度中

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諸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纏縛。爲達到此項目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中山全著——函覆)

中山先生逝世二十餘年期間，中蘇雖不幸因中東路事件一度絕交，然未及三年，即行復交。抗戰軍興，復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我英勇的浴血抗戰，陷日本於泥淖，減少蘇聯東顧之憂。同時，物質上，道義上，蘇聯實給我以巨大之援助。我抗戰進入第三年時，中蘇又締結平等互惠之商約，益增強兩國間之密切關係。珍珠港事變以前，我抗戰唯一之奧國即爲蘇聯，而終於戰爭勝利之時，締結以三十年爲期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彼此倘能信守盟約，促進和平，更可發揚兩國立國之真精神。

所不幸者，德日投降以來，盟國間之矛盾加深，舊時代之強權政治，又有復活之勢，癥結所在，爲戰後美蘇兩最大強國之未能諒解，未能互信。在大戰期中，此一世紀傑出之世界政治家羅斯福總統，本其愛世界，愛人類，愛後代之宏願，運用其明敏之巨腦，增進美蘇合作，調整英蘇關係，以贏得勝利，並期繼續此政策，通過一健全的國際新社會——聯合國，來維持戰後世界之長期和平。

同時，美國遠見之政治家，亦以戰後世界和平之維持，大半有賴於美蘇兩巨強之合作。威爾基先生於一九四三年初，當史城保衛戰勝利時，在紐約時報雜誌撰文，主張美國應盡力認識蘇聯，亦使蘇聯盡力認識美國，目的爲使兩國戰後

之合作亦如戰時，並言：「以地理言，商務言，及其他諸種問題所持觀點之相同言，美國與蘇聯宜謀攜手」。威氏在其所著「天下一家」中，復強調美國應在戰後與蘇聯通力合作，「蓋蘇聯爲一有生力之國家，一富有活力之新社會，一種未來世界中不能忽視之力量」。又華國開明之政論家，述及晚蘇邦交時，遠溯至美國獨立戰爭以來與俄國之友好關係，進而贊揚羅斯福總統之竟能不計美蘇間意識及主義之距離，毅然於一九三三年承認蘇聯，尤其贊佩其在大戰期間聯蘇之明智與正確。足智多謀之美前副國務卿威爾斯（Symner Welles）對蘇聯在戰後之巨大勢力，亦極爲重視言：「蘇聯能給世界以最大之威脅，爲世界最大之潛力，能變爲和平及使世界秩序正當發展之最大力量。蘇聯將來所採之途徑如何，大半視美國之能否勸導蘇聯人民與政府，使之明瞭，與美國合作以創立保持一民主有效的世界組織，爲其真實利益之所在。」（Symner Welles-The Time For Decision P.336）

羅斯福總統維持世界和平之宏願亦即在此。惜乎其竟資志以終，實爲世界和平之一重大打擊，世界人類之一重大損失。無怪乎其子伊利奧·羅斯福在其「見聞秘錄」（As He Saw It 羅斯福見聞秘錄——李嘉譯）中痛切言道：「……羅斯福死後，現代世界進步的力量，失掉了牠的最有影響與最有說服性的導師。由於他的死，爲世界所有國與國間人民與人民間的團結一致最明確的呼聲停頓了。更有甚於此者，對世界任何角落的人民言，他不僅是美國的象徵，又是自由的象徵。人民將解放與建立一和平富足新世界之希望，全寄託在他身上，他死了，人民的一切希望也隨他的死去而幻滅，也失掉了他們的信心。」

大戰後，美國憂時之士，如華萊士先生等，有鑒於強權政治之復活，軍備之競賽將招致戰爭，而原子武器戰爭之後果，將使整個文明世界毀滅，起而熱烈的呼籲美蘇之諒解，主張美蘇美合作，以保障世界之和平。談到美蘇之諒解，威爾斯先生在其最近出版之「我們在向何處走？」一書中（Where Are We Heading?），回憶羅斯福正確之觀察言：「……